

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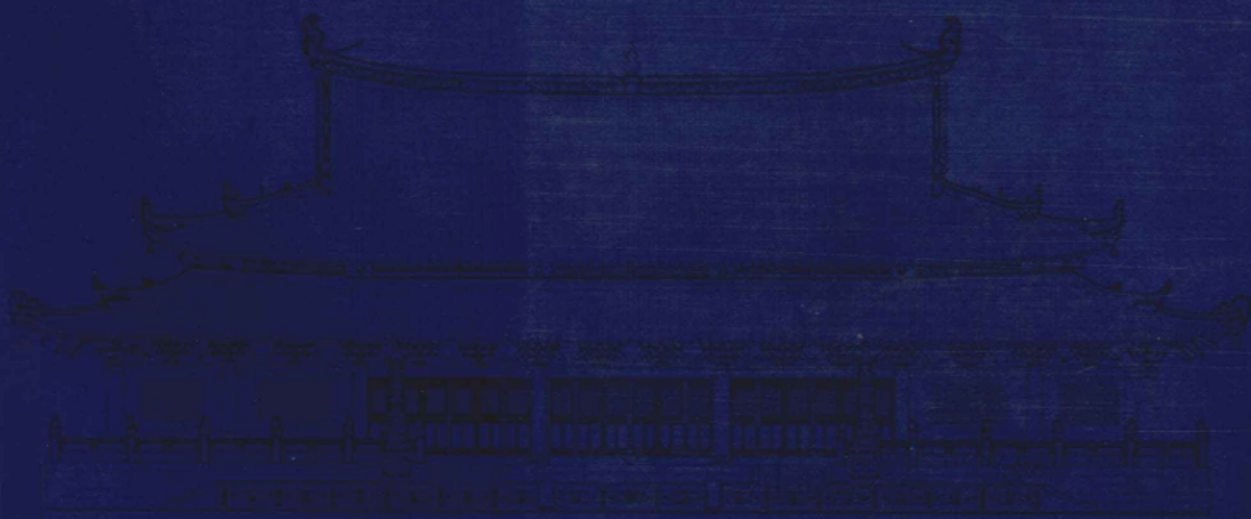
光孝寺

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

程建军

李哲扬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由以下项目经费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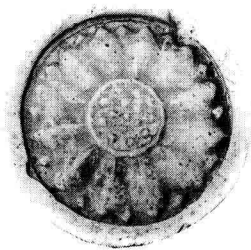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编号：2008BAJ08B02）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编号：2009ZC1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编号：06025731）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 与保护工程报告

程建军 李哲扬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程建军,李哲扬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112-12644-6

I. ①广… II. ①程…②李… III. ①寺庙-古建筑-
修缮加固-研究报告-广州市 IV. ①TU 7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663 号

本书分为研究篇和保护工程篇,研究篇对光孝寺的历史文化、建筑格局沿革和建筑形制与法式作了详尽的研究探讨。保护工程篇对光孝寺的明清主要殿堂的建筑修缮勘察设计与保护工程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本书附有大量工程图纸和照片,以及勘察测绘设计数据表格。

本书可供建筑院校师生、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人员、文物保护研究设计和施工单位人员阅读参考。

* * *

责任编辑:常燕 李春敏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

程建军 李哲扬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霸州市长虹图文有限公司制版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18 $\frac{1}{8}$ 字数:441千字

2010年12月第一版 201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0.00元

ISBN 978-7-112-12644-6
(199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广州光孝禅寺上继三国贤臣学韵，下启南朝禅律宗风，挟千年之心印法嗣，傲踞岭南古刹之首，其殊胜因缘，名胜古迹，早为教内外人士所咏赞；而又作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之史证，中印文化交流之始俑，建筑塔幢艺术之瑰宝，其妙相庄严，文物荟萃，无不中外人士所瞻仰。悠久的历史，禅宗的泰斗地位，丰富的文物收藏和建筑的艺术魅力，使其早在 1961 年就列为我国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以来，光孝寺开始衰落，及至以后殿堂僧舍的改作他用，致使寺内已无僧人和宗教活动，一代名寺前景堪忧。1978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重新重视统战工作和宗教政策的落实，1980 年将光孝寺重新交由宗教部门管理，聘请当代禅宗泰斗释本焕大和尚任主持，光孝寺遂重新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此同时，成立了光孝寺修缮委员会，寺庙的保护修建工作也随即展开，以满足正常的宗教活动。经过 20 年的保护修建，建筑格局渐成气候。但建于清初顺治年间的大雄宝殿、康熙年间的六祖殿和弘治年间的伽蓝殿经数百年的风雨，已是年久失修，处处隐患。从岭南地区的历史建筑统计分析来看，光孝寺的明清三大殿堂无论在规模、形式上，还是在法式、形制上，都是岭南古建筑之精粹。其对研究岭南建筑历史之发展、建筑技术、艺术之发达，禅宗建筑之制度以及探索与中原建筑法式之关联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为保护好岭南这一重要建筑历史文化遗产，2000 年由省宗教部门组织指导，继第一次修缮后再次成立了光孝寺修缮委员会，开展三大殿的勘察修缮设计和修缮施工工作。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研究所承担了修缮的勘察设计工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原则，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和专业性知识，我们进行了周密的修缮勘察设计组织策划，同年建筑勘察测绘即时展开，经过严谨细致的工作，于 2003 年完成了三个殿堂的修缮施工图设计。2003 年三个殿堂逐次开始修缮施工工程，至 2006 年修缮工程全部竣工并通过了文物部门的验收，2008 年大雄宝殿和伽蓝殿修缮工程获得“广东省优良样板工程”奖。

作为勘察设计主持人、修缮工程总工程师，笔者参与了光孝寺建筑研究、修缮决策、勘察设计、现场施工以及保护规划的全过程，工程期间研究并解决了一些建筑修缮理论与实践遇到的一些问题，现将这次修缮勘察设计及修缮工程总结编辑成书。本书分为研究、保护工程上下两篇，研究篇对光孝寺的历史文化、建筑格局沿革和建筑形制与法式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探讨；保护工程篇对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作了探讨，对光孝寺的明清三大殿堂的建筑修缮勘察设计与保护工程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本书还附有大量工程图纸和照片，以及勘察测绘设计数据表格，以保全资料和供业内参考。

目 录

第一篇 研究篇

1. 光孝寺历史文化述要	3
1.1 光孝寺历史沿革	3
1.2 光孝寺的宗教地位	8
1.3 光孝寺的社会文化影响一瞥	12
2. 光孝寺建筑格局沿革	15
2.1 建筑规模与布局	15
2.2 寺院发展与演变	20
2.3 保护与发展	36
3. 光孝寺建筑形制与法式	43
3.1 大雄宝殿建筑形制与法式	43
3.2 六祖殿建筑形制与法式	57
3.3 伽蓝殿建筑形制与法式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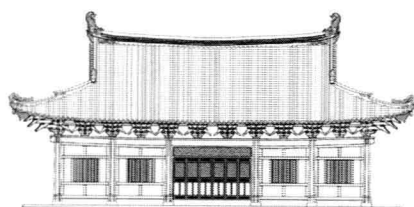
第二篇 保护工程篇

4.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真实性”内涵的演绎	75
4.1 真实性的定义	75
4.2 文物建筑保护中真实性的概念的发展	75
4.3 国际性文物建筑保护和修复理论形成与发展	77
4.3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与概念	81
4.5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概念再认识	83

目 录

5. 光孝寺建筑勘察修缮工程	85
5.1 大雄宝殿勘察修缮设计	85
5.2 六祖殿勘察修缮设计	111
5.3 伽蓝殿勘察修缮设计	127
6. 光孝寺保护工程图版（节选）	137
6.1 测绘图	137
6.2 修复设计图	152
6.3 修缮前图片	167
6.4 修缮工程图片	175
6.5 修缮后图片	195
6.6 历史图片（包括部分文物图片）	202
附录一 建筑构件编号图	208
1）大雄宝殿	208
2）六祖殿	218
3）伽蓝殿	223
附录二 建筑构件勘察检修登记表（节选）	228
1）大雄宝殿	228
2）六祖殿	252
3）伽蓝殿	267
后记	281
致谢	283

第一篇



研究篇

1. 光孝寺历史文化述要

1.1 光孝寺历史沿革

广州是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有“三朝十帝”的地方封建政权建都于此。秦汉时期，南越王赵佗在广州立南越国，建番禺城。唐宋明清均有城厢扩建，城内遍布古代建筑遗址。就佛教建筑来说，有光孝禅寺、华林寺、海幢寺、大佛寺、长寿寺五大丛林，但无论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还是对禅学的影响深远，首屈一指的当属光孝禅寺。

光孝禅寺全称为“报恩光孝禅寺”，俗称光孝寺，位于广州市西门内光孝路北端，是广州古代五大丛林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寺院。据清朝顾光编修的《光孝寺志》记载，寺址初为西汉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故宅。三国时，岭南是东吴属地，吴国骑都尉虞翻（164~233年）性格耿直，不避权贵。东吴大帝年间（222~252年），大约公元223年，因得罪孙权而谪徙广州，居住在今光孝寺一带的赵建德故居原地。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为三国时期著名经学家、哲学家，其才学过人，文武双全，既能统兵打仗，又能著书立说，兼通医理和占卜，著有《易注》九卷，号称“虞易”。在广州的十多年间，他居此聚徒授学，四方之士慕名而来，生徒达数百人之众。同时其于居处着意经营园囿，将庭院辟为苑舍，园中多植苹蓐、柯子，绿荫成林，时人称为“虞苑”、“柯林”（后也有人写作“苛林”、“诃林”）。今光孝寺山门仍悬挂着“诃林”匾额，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翰林院编修区大相的手迹。东吴嘉禾二年（233年），年届70的虞翻歿后，家人被赦免返吴，清顾光《光孝寺志》记载其“后人舍宅为寺”，名“制止寺”^[1]。陈宪猷校注的《羊城古钞》解释“制止”为“制心止”，意即“抑制心欲之动，不使外物之动而作恶”。从寺庙大殿现存大殿建筑东西阶的古制看，此式早在西周士大夫住宅成为制度，其建筑早期作为住宅的可能性极大，舍宅为寺有一定依据（图1-1、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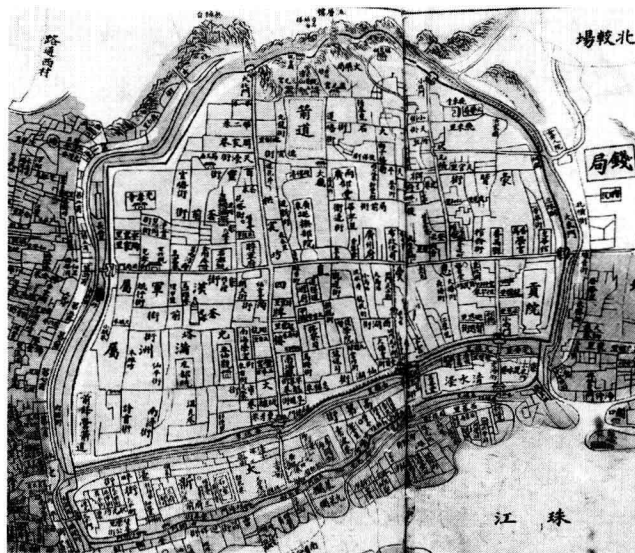


图 1-1 光孝寺地理位置（城内西北角，清光绪二十六年）



图 1-2 明代“诃林”匾

[1] 清·顾光.《光孝寺志》[2].

虞翻身后，苛林成为佛寺，即光孝寺前身，至今已有 1776 年的历史，是岭南历史最为悠久的佛寺，其“岭南第一古刹”的称谓可谓实至名归。光孝寺历史之悠久足可媲美古番禺城，在广州，“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早成口碑。文献中记载，历史上光孝寺先后建有虞翻庙和虞翻祠，以纪念这段史实和佳话，惜纪念虞翻的庙、祠建筑现在均已不存。

嗣后，众多中外高僧如达摩、不空、慧能、义净等都曾在这里弘法布道，成为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汇聚的道场；禅宗南宗、密宗、律宗等许多佛教宗派在这里开始传播，成为佛教宗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摄大乘论》、《俱舍论》、《楞严经》等许多重要佛教经典在这里被译成中文，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场，对推动佛教文化的传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使广州光孝寺成为海内千年名刹之翘楚。

广州自西晋始，城市日益繁荣，目前出土的晋墓砖铭文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2] 岭南佛教也有了逐步发展，寺观的建设也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城西建有多座寺庙。如泰康二年（281 年）建有王仁寺，明成化《广州府志》称：“护国王仁禅寺在郡西濠街，晋泰康二年梵僧迦摩罗尊者自西竺来始建”。有人认为迦摩罗尊者极可能是最早由海路进入中国的僧人。

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海上贸易的日益发展，来岭南弘法的海外僧人逐渐增多，而光孝寺成为印度来华僧人驻锡说法的首选。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 年），较早到广州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在广州传教。据南朝梁代慧皎（497~554 年）《高僧传·译经上》记载，昙摩耶舍“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长而气干高爽雅有神慧。该览经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禅游心七觉。”说耶舍自幼聪明，善有慧根，博览群书，精通经、律、论三藏，被称为“三藏法师”。“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入长安”（《高僧传·译经上》）。东晋隆安年间（397~401 年），昙摩耶舍经海路来到广州，住在制止寺。时年已有 85 岁，信徒众多。其中还有广州刺史张牧的女儿张普明，昙摩耶舍专门给她讲授《佛生缘起》，还为她翻译了《差摩经》一卷，这是光孝寺翻译佛经的最早记载。由于制止寺是舍宅为寺，建筑空间不敷使用，耶舍便将虞翻宅扩建，创建大殿五间，建大雄宝殿等主体建筑，改寺名为“王苑朝廷寺”，简称“王苑寺”，似还有王宅故居的影子。义熙年间（405~418 年），耶舍离开广州，北上传法。^[3]《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载其为光孝寺的开山祖师（图 1-3）。



图 1-3 昙摩耶舍像（自 www.ruyihai.cn）

[2] 《广州简史》[2].

[3] 胡巧利，著.《光孝寺——岭南文化知识书系》[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P13-14.

南朝时，据《光孝寺志》记载，僧人求那跋陀罗（394~468年）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到寺中驻锡。求那跋陀罗，中天竺（印度）人，出身婆罗门贵族，《高僧传·译经上》记载其“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出家专攻佛学，精通佛教经、律、论三藏，是一位学通内外的高僧。《光孝寺志·卷三·古迹志》记载：永初元年求那跋陀罗来寺弘法传道时，见寺内苛林成荫，环境清幽，便指着苛子树对人说“此西方苛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遂相度地势，创建戒坛，始立制止道场”（图1-4）。

戒坛为僧徒受戒之场所，早于汉魏之际所设立，尤以律宗所推崇。宋高承《事物纪原·道释科教·戒坛》：“汉魏之僧，虽剃染而戒法未备，唯受三归。嘉平、正元中，既传戒律，立大僧羯磨法，斯盖比丘立戒坛之始也。”由于求那跋陀罗创立戒坛，制止寺成为岭南第一道场，他也被视为光孝寺的第二位开山祖师。

求那跋陀罗在制止寺创建了毗卢殿，供奉毗卢遮那佛。后来其北上传法。梁永明年间（483~493年），奉旨译《伽毗利律》、《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等大量佛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胜鬘经》和《楞伽经》。《楞伽经》被禅宗奉为宗经之一，也是禅宗早期最重要的经典，是达摩禅教的理论根基。同时也为多种宗派所信奉。

梁代，岭南佛教获得空前发展，来中国传法的外国高僧也越来越多。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智药三藏自海路从印度来穗，携来菩提树种植在戒坛前，至此时大型佛寺规制渐全。据《光孝寺志》记载，他在种植菩提树时预言说：“吾过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结果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惠能在光孝寺落发出家，在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到其时恰好174年，应验了他的神奇预言。他还于寺内开挖了“西来井”，成为光孝寺的第三位开山祖师。

《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记载：“达摩初祖，自至天竺，止于柯林。”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东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建寺”，经三年颠簸抵达广州，在珠江北岸的绣衣坊码头登岸，即现在的下九路西来正街一带。他登岸后结庐为庵，弘扬佛法，广州人称此地为“西来初地”，今仍有“西来古岸”石碑立于路边。其庵称“西来庵”，后发展为广州长寿路华林寺。他把禅宗的衣钵带到中国，后至光孝寺开讲传教，留下了“达摩井”、“达摩像碑”等文物古迹，最后至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传教（图1-5~图1-7）。

禅宗自迦叶“拈花微笑”，至东土禅宗初祖达摩立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



图1-4 求那跋陀罗画像（自《百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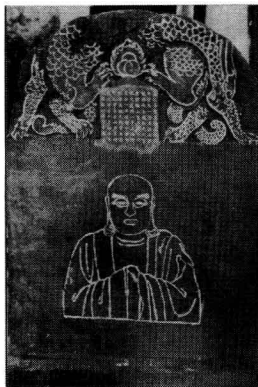


图 1-5 达摩像碑（自《光孝寺志》）



图 1-6 广州下九路“西来古岸”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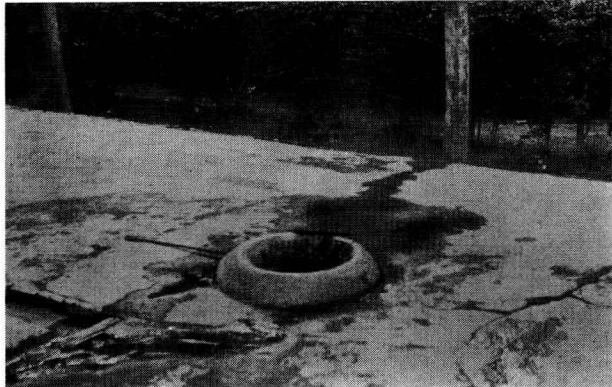


图 1-7 达摩井（自《光孝寺志》）

字，教外别传”十六字玄旨，主张通过壁观，反照内心，认识自本真性，达到无爱憎、无得失、无悲喜、无是非，舍伪存真，超脱一切的精神境界。达摩把衣钵传给二祖慧可，授四卷《楞伽经》，慧可再传给三祖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祖惠能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又回光孝寺落发，大开东山法门，尊《般若》，主张“顿悟成佛”。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禅宗遂盛开五花七叶。自初祖达摩来光孝寺驻锡传法，到六祖惠能回光孝寺传承禅宗法脉，真可谓冥冥之中之殊胜因缘。由于菩提达摩对禅教的贡献及其与光孝寺的关系，寺志载其为光孝寺的弘法祖师。^[4]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光孝寺改名为“乾明法性寺”。该名与南朝刘宋时来寺梵僧摩诃乘者有关，寺志称其“通达大乘，游法性海也”。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惠能驻锡光孝寺，开创佛教南禅宗。唐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时，易名为“西云道宫”。

南汉乾亨元年（917年）南汉主刘龚大兴土木，离宫别馆数百，楼台池苑遍布。此时光孝寺改名为乾亨寺，相传当时寺内后园即为刘龚避暑之所。据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载：“寺后有园一区，树石亭台，回廊曲沼，颇饶幽趣，相传为刘龚避暑之所。寺僧历来修葺之，故虽已数百年，尚未颓废。”今天，光孝寺仍可见寺庙园林之韵味。

光孝寺入宋多次改名，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易名为“乾明禅院”，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复改“乾明法性寺”，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奉诏并寺为“祖堂”。崇宁二年（1103年）改称“崇宁万寿禅寺”，政和元年（1111年）再改“天宁万寿禅寺”等。宣和元年（1119年），帝信方士之说，改佛为大觉金仙，僧为德士，改寺为宫观。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发布诏令改寺名为“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

[4] 《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

(1151年)易“广”为“光”，称“报恩光孝禅寺”，同时“苛林”改为“柯林”，从此光孝禅寺名沿袭至今。

历经晋、唐、南汉，宋代的光孝寺建设规模得到了很大发展。据寺志记载，光孝寺的殿堂院阁，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僧众多达130余人。这里当时早已成为名胜之地，为游人的好去处，“光孝菩提”遂成为宋代羊城八景之一（图1-8）。

元代元世祖十六年（1279年），光孝寺诏设僧禄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元帅吕师夔支持下，光孝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建，盛极一时。寺内观音殿、宝宫后殿、悉达太子殿、檀越堂、兜率阁等建筑都是这个时期增建的。

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实行严厉的控制，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颁下诏令，限制全国各地寺院的数量，对各地僧尼的数量和出家条件也作了严格限制，岭南佛教发展也进入了最沉寂的时期。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僧纲司管理佛寺。鉴于光孝寺的特殊地位，敕光孝寺僧正源为本寺都纲，置正副僧官，光孝寺成为官寺。这是光孝寺成为官寺的明确记载。^[5]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颁赐《大藏经》一部十柜，成化十八年（1482年）应寺僧请求，宪宗敕赐“光孝禅寺”匾额。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本寺僧戒钦呈行，将该寺田地均分十份，号称“十房”，本次分房大大削弱了光孝寺的实力，可以说是光孝寺走向衰微的开始。尽管有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本寺众僧捐资重修寺宇，但嘉靖以后光孝寺逐渐衰落了。明代后期，许多房产被外人占据，寺院的僧舍殿宇竟成了书舍、民居。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光孝寺再次修复殿宇时，住寺僧通岸、通炯、起逸等募缘赎回的寺内地址就达24所，可见当时光孝寺衰败的境地（图1-9）。

清初，当朝皇帝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以佛教辅治国，岭南佛教再次兴起。岭南的平南王尚可喜也刻意亲近佛门，大建佛寺，并请有影响的和尚讲经说法，笼络人心。广州的海幢寺、大佛寺都在这个时期兴建起来，对光孝寺的修建也多有促进。顺治六年（1649年），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天然和尚应请出任光孝寺住持。他广集资金，在平南王、靖南王和信士的支持下，重修殿宇古迹，并以儒家忠孝廉洁教诲门徒，以佛教慈悲喜舍之精神感化人心，使岭南佛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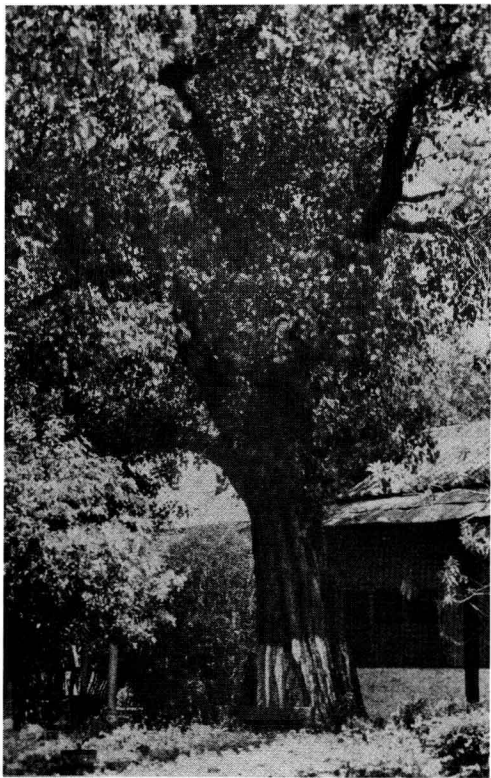


图1-8 菩提树（自《光孝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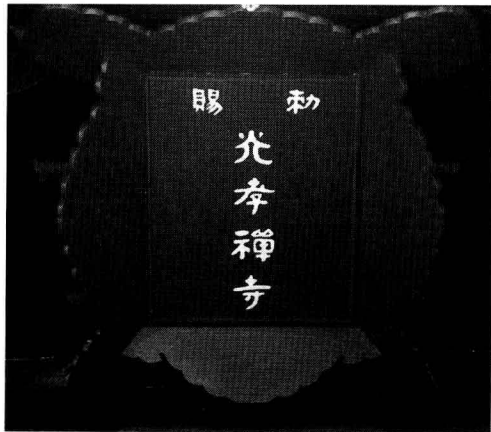


图1-9 敕赐“光孝禅寺”匾额

[5] 清·顾光.《光孝寺志》[2].

现了新气象。在憨山德清及天然和尚的苦心经营下，光孝寺又成为岭南弘法的十方丛林。顺治十一年（1654年），光孝寺大修后，大雄宝殿由五开间扩建为七开间，匾额曰“祝圣殿”。此后，光孝寺又进行过多次修缮。但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南下时，清军占用寺院前后房舍作为兵营，致使光孝寺规模大为缩小，光孝寺遭到的严重破坏是难以弥补的。清末，张之洞提出“庙产兴学”，至民国，这一主张又多次被重提，佛教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北伐战争时期，当局要求佛观变卖寺产充军饷，广州多处寺庙建筑进一步遭到破坏。嗣后，光孝寺长期被文化教育部门及军政机关占用。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光孝寺的重要文物价值，1963年光孝寺被列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主要殿堂得以保存。但寺院房地仍由省文化部门、文艺团体接管使用，寺内几无僧人。^[6]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党的宗教政策逐步恢复和落实，各类宗教场所逐渐对外开放。为振兴千年古寺，发挥僧人爱国爱教的积极作用，1986年，在国务院的指示下，光孝寺重新交由广东佛教界管理，作为宗教场所佛教寺院正式对外开放，广东省佛教协会迁入光孝寺办公。与此同时，在省民委和宗教局指导下，成立了以禅宗泰斗本焕大和尚为首的光孝寺重修委员会，募集资金对寺院进行全面保护修缮。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寺院面貌焕然一新，再次向世人呈现出其庄严优雅的丛林道场之特质，以及所蕴含的本性宗风之禅机。

1.2 光孝寺的宗教地位

唐代中叶，中国佛教出现了禅宗这一新的教派。“禅”是从印度的“禅那”音译而来，意译是“思维修”或“静虑”。它是禅宗的独特修行方法，从本质上反对传统的参禅打坐和习经，认为“若识本性，即是解脱”、“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修行既不需要控制自我官能（根），也不必改变对外界（尘）的观念，更不必选择特定的道场，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平常人的心识，即可得道成佛。所以说禅宗主要是以心性修行、以调整内心世界为主的独特思维方式。

据禅宗的说法，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除了说“教”之外，还有一种“教外别传”的“心法”传授，前者为“教门”，后者为“宗门”。这种“密意”或“心法”，在印度经过二十七代的传授，到梁武帝的时候，由达摩传到中国，达摩由此成为东土禅宗初祖。五祖弘忍定居于湖北黄梅双峰山传教，至弘忍传衣钵时，出题让众僧人作偈，以选择继承衣钵者。大弟子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出身

[6] 胡巧利，著.《光孝寺—岭南文化知识书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P108.

卑微的碓米僧惠能则做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外惹尘埃。”此四句偈语深悟禅机，胜过师兄神秀，弘忍密授迦裟给惠能，惠能得禅宗衣钵，成为东土禅宗六祖。

神秀和惠能的这两个偈，是禅宗的重要文件，其内容是相互对立的。神秀所说的是原来的佛学，一棵菩提树，一个明镜台，表明他所说的心是个体的心。他认为对于这个心，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把尘埃和菩提树、明镜台对立起来，不知道尘埃就是菩提树、明镜台，万法万境就是自本性。惠能否定了神秀的偈，提出了“本来无一物”，即否定了神秀个体的心的说法。但弘忍说：惠能的偈“亦未见性”，因为他把自本性和尘埃都讲空了，也没见到自本性的本来的样子。所谓本性就是宇宙的心，本性或本心，对每一个人都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又称自本性。惠能在其代表著《坛经》中对其有了深刻的感悟，他强调众生“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又强调“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这成为南禅宗门的理论纲领。

据《坛经·自序品》载：惠能姓卢，出生广东新洲（今新兴县），其父本是北方的一个官僚，后来被贬到广东。他幼年以卖柴为生，后前往湖北黄梅随五祖弘忍习禅。弘忍传授衣钵给惠能时，告诉他立即离开寺院，恐怕有人争夺衣钵而加害于他。惠能遂连夜南逃，两月后到大庾岭，后在岭南隐居十六年。唐仪凤元年（676年），惠能至光孝寺混在人群中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恰巧风吹幡动，人丛中一僧说是幡动，而非风动，另一僧争辩说是风动，而非幡动，众僧争议不下。惠能插话说：“风幡非动，仁者心动！”一语妙演禅机，震惊满堂，连正在讲经的印宗法师都为之折服。此后主持印宗亲自为他在菩提树下削发，后人募资建六祖瘞发塔和风幡堂以资纪念。风幡之论是说：风是动的，幡也是动的，但平常人不了解动的真相，所以不知道风、幡都是动而常静，所以说“仁者心动”，其道理是很深奥的。风幡之论亦成为中国佛教史中的著名案例（图1-10、图1-11）。

禅宗与中国佛教发展关系密切，这是众人皆知的事，但光孝寺与禅宗的关系和在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地位则较少人注意。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知广州府事仁和顾光在《光孝寺志》中明确指出：“光孝自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二尊者创立道场，嗣后初、六祖先后显迹于此，一时宝坊净域，为震旦称首，数百年来宗风远布，暨于南朔，而一花五叶，实维此方为泯源之始导。然则兹寺之所系，不啻儒门阙里，非十方常住饭钟



图 1-10 六祖像碑（自《光孝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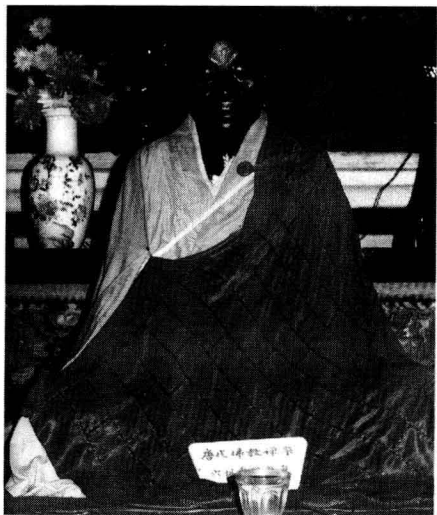


图 1-11 六祖慧能真身（奉韶关南华寺六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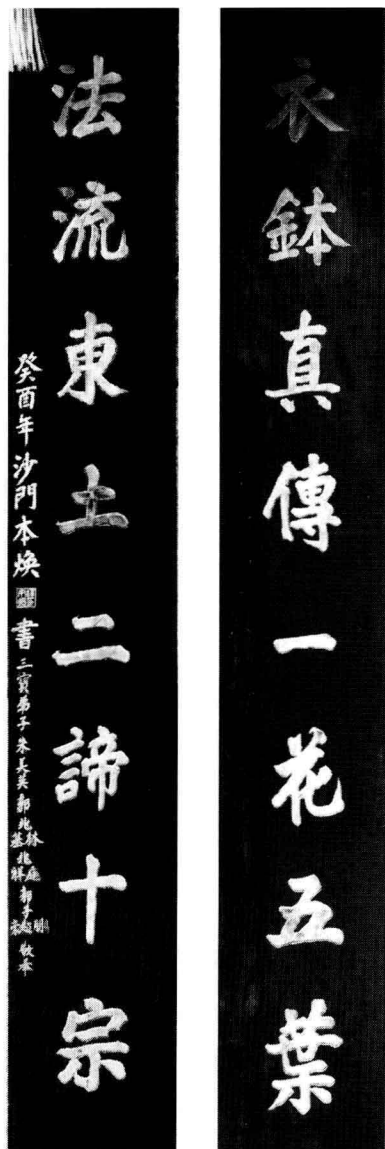


图 1-12 六祖殿本煥大和尚题楹联

粥鼓之地也。”顾光之所以这样高度评价光孝寺是有充分理由的，光孝寺宗教文化地位确非平常，今将历史事实简单罗列如下，读者自明。

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僧菩提达摩自海路来华，先驻足于光孝，海人以禅学，后来北上少林弘法，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虽名显于北方，但其禅教早已植根于光孝。据记载，该寺洗钵泉就是达摩居光孝寺之遗迹。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已得五祖暗传衣钵的惠能大师在此因辩风幡奥意而被识于世，住持印宗大师喜为剃发受戒，正式成为禅宗六祖，即于寺内菩提树下首演东山法门，别开顿悟之说，南派禅宗自成一系，与北方渐悟禅教互放异彩。

唐朝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林清规乃历来之说，但详考史实，则梁朝时已有光孝寺之法云法师奉敕制定禅林规约，惜未广为推行，为人所略。

先是初祖始传法音之地，继为六祖法缘深系之处（僧人视法受戒之寺院及法师法缘所在），又因六祖阐扬之南派禅宗盛行，北方一系亦渐归其门，以后一花分五叶：云门、法眼、曹洞、临济、沩仰。禅宗遂无南北之分，故凡禅门弟子，皆以光孝为祖庭。正如天王殿旧日楹联所书：“禅教遍寰中，兹为最初福地；祇园开岭表，此是第一名山。”又如当今禅宗泰斗本焕大和尚所题六祖殿楹联所书“衣钵真传一花五叶，法流东土二谛十宗”（图 1-12）。

佛教以戒律为重，无论任何宗派之佛教徒，出家或在家，均须严持净戒，故中国最先有律寺，禅寺之丛林清规即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光孝寺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由求那跋陀罗设立戒坛，是中国南方最早设有戒坛的寺院，梁代法云法师奉敕制丛林规约时，亦以律教融合禅宗而创立。自东晋至唐，有昙摩耶舍等多名著名法师来传授戒法和弘扬律学，所以说光孝寺又为南方传戒之主要道场。

据胡巧利先生研究，光孝寺还与密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密教又称密宗，也称真言宗，是印度佛教在公元6世纪后发展形成的一个佛教派别。这一佛教宗派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仪轨和世俗信仰为其主要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即“语密”）、手结契印（手势，即“身密”）、心作观想（即“意密”），身、口、意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是不能见诸文字、广为传布的，只能对接受灌顶仪式的弟子秘传。因此，被称为密宗或密教。

密宗传入中国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密教由善无畏传入，海路密教则由金刚智和不空师徒传入，三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尤其是不空（705~774年），对于密宗在中国的传播贡献最大，研究佛教史的学者认为，不空是推动密宗在华迅速发展的关键人物。不空是狮子国人，早年拜金刚智为师，开元七年（719年）随金刚智来华传教。根据僧史的记

载，不空曾三度到广州传法，还在光孝寺首次举行了开坛灌顶仪式。金刚智和不空第一次到广州时就住在光孝寺（法性寺）。第二年，北上洛阳，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并封金刚智为国师，请他住在慈恩寺。开元二十年（732年）金刚智去世，奉玄宗之命，不空前往五天竺、狮子国取经求法，不空于是第二次来到广州，又住在光孝寺。此时的不空，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修为超群的高僧。他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南海太守刘巨鳞的隆重接待。不空在光孝寺举行了开坛灌顶仪式，进行了弘传密宗的活动。这次传法是密宗在岭南的首次传播，追踪密宗入华的轨迹和传播历史，光孝寺堪称是“西来初地”和传播要站，在中国密宗传播史上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不空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受到皇帝的厚遇，被尊为三朝国师。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授他“大广智三藏”称号。

光孝寺庭院的西南角有一珍贵的唐代文物——石经幢，上刻“大悲心陀罗尼经咒”，故称其为“大悲心陀罗尼经幢”，为唐代密宗曼陀罗重要法器之一。虽然现存之物残缺不全，字迹也难以辨认，但它却是光孝寺曾经举行过密宗建坛、灌顶仪式的历史见证。^[7]而光孝寺早期便建有供奉与密宗关联的毗卢佛的毗卢殿，也说明其与密宗之关系。

所以说禅宗、律宗、密宗都与光孝寺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光孝寺还是中国南方重要的译经场所。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翻译文学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自东晋起，光孝寺已开始经营这一伟大事业，成为岭南的重要译场，至陈、隋两代更具规模，中国著名四大翻译家之一的真谛三藏法师，在此展开他的毕生宏愿，翻译并弘扬《摄大乘论》、《俱舍论》、《涅槃经论》及《大乘唯识论》等，为唐朝之佛教发展奠下根基。当时，光孝寺以慧恺为主，形成了有僧宗、法忍、法泰、法准等学僧参与的民间译场。宋朝知军州蒋之奇在寺内建有译经台和笔授轩，以颂译经大德。

光孝寺重要译经简录如下：

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年），罽宾国人昙摩耶舍（Dharmayasas），译《差摩经》一卷，武当沙门慧严笔授。

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译《伽毗利律》及《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

西印度优禅尼国（Ujjayanj）人波罗末陀（Paramartha），即真谛三藏，梁大同中（535~546年）受命抵梁，548年进入京邑，梁武帝请其译经。侯景叛乱后，辗转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562年抵广州光孝寺，译《僧涩多律》、《摄大乘论》、《俱舍论》、《大涅槃经论》、《大乘唯识论》、《佛性论》和其他经论50余部，沙门慧恺笔授。真谛来华23年，共译出经论记传64部278卷，其主要经典的翻译是在广州光孝寺完成的。

[7] 胡巧利著.《光孝寺—岭南文化知识书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P75-77.